

孙中界事件再调查

第三方挖出「钓钩集团」

联合调查组成员接受快报专访,揭秘「孙中界事件」真相

10月26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对“孙中界事件”重新认定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依法终止执法程序”,浦东新区区长姜■代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至此,孙中界——这个河南籍“90后”小伙,在“断指证清白”的12天后,终于换回了自己的清白。而上海是否存在“倒钩执法”现象,也在一波三折的调查真相大白,“倒钩执法”确实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真相的揭开,完全有赖于浦东新区政府20日重新组建的联合调查组,而有关联合调查组如何组建、如何展开调查等具体情况却一直鲜为人知。近日,作为中央媒体代表参与联合调查组的李月(化名)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披露了“孙中界事件”真相调查过程前前后后。

□快报记者 陶维洲 | 上海报道

真相揭开 孙中界“平反”

10月26日中午,上海浦东新区新闻通气会现场座无虚席,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在等待着“孙中界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当浦东新区区长姜■表示,“联合调查组”关于10月14日“孙中界事件”的调查报告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10月20日公布结论与事实不符,并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全场沸腾了。

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显示,10月14日,原南汇区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一社会人员将执法的时间、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陈雄杰在浦江镇召泰路闸航路口扬招孙中界驾驶的车牌号为浙 ADS595 白色金杯车。该车载陈雄杰驶至闸航路188号时,被执法人员检查。执法人员为陈雄杰制作了笔录,作为该车从事非法营运的证据。“乘客”陈雄杰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调查组在对陈雄杰访谈过程中,其否认有其他以“乘客”身份作非法营运的行为,但调查组在抽查原南汇区行政执法大队其他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了陈雄杰曾有以“乘客”身份作非法营运的笔录。

至此,“孙中界事件”真相大白,事件主角——河南小伙孙中界确实遭遇“钓鱼式执法”。对于这一调查结果,孙中界面对媒体的采访喜悦而泣,连连表示“终于重获清白”“对调查结果很满意”。而对于为证清白而自断一指的举动,孙中界也表示“值得”。

就在同一天,同样被质疑为“钓鱼式执法”的“张晖事件”也有了结果。闵行区政府宣布“张晖事件”取证方式不正当,撤销行政处罚行为。

这一切的发生,要归功于一个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在内的12人联合调查组,正是他们介入该事件后的独立调查,将事件的真相还原。

兵分三路 独立调查

联合调查小组成立于10

媒体多天来的关注和调查,上海存在“钓鱼式执法”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且浦东新区这种自查的方式本身其公信力就值得质疑。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浦东新区政府当天就重新组建联合调查组,引入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对此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城管部门明确排除在调查组之外。

“我是在当天下午接到邀请参加联合调查组的。”李月说,当时他人还在外地,但接到邀请后就在最短时间内赶回上海。“回来后才知道,联合调查组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因为涉及调查取证,所以律师和记者成为必不可少的成员。”

李月告诉快报记者,由于从一开始,“孙中界事件”争论的焦点就是其是否从事了“非法营运”和执法人员是否使用了“钓鱼式执法”,所以联合调查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孙中界是否是“黑车”和原南汇区行政执法大队在对孙中界驾驶浙 ADS595 载客的执法过程中,是否采用了不正当手段取证。

于是,调查组被分成三组,每组3-5人不等,第一组负责调查孙中界的情况,第二组负责调查执法过程是否正当,第三组则负责调查孙中界的伤情情况。在随后的三天中,三个调查小组赴孙中界工作的上海鹿源建筑工程公司、原南汇区交通警察大队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进行了现场调查。

“我被分在第一组,主要调查孙中界的情况。”李月说,21日,即联合调查组成立的第二天,调查就开始了。“我们的调查主要采取访谈形式,在上海鹿源建筑工程公司,我们小组见到了孙中界、孙中界的哥哥孙中位和鹿源建筑工程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李月说。

在证实了孙中界所开车辆确为公司车辆后,孙中界向调查组回忆了14日当天的情形。那天晚上8点左右,刚把一批工人送到公司基地的孙中界,在上海浦江镇召泰路闸航路口遇到一名身材瘦弱的年轻人扬招,但他上车4分钟后便要求停靠在闸航路188号。正是在这里,孙中界受到了原南汇区交通警察执法大队的检查,认为其“涉嫌非法营运”而扣下金杯面包车。孙中界称,当时是看那名乘客实在可怜才让他搭车的,而且那名乘客要给钱,他一直没有理他。

“在获得这些一手资料后,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孙中界所驾驶的车辆的为公司车辆,至于孙中界是否非法营运则还要和其他组调查的内容互相印证。”李月说,三个小组都是独立进行调查,互不干涉,每天调查结束后会在一起交流当天的调查内容。

财务资料 牵出“钓头”

和第一组、第三组的调查任务相比,第二组调查的内容尤为重要,调查难度也最大。“不过,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浦东新区各部门为我们的调查开了绿灯,而且还派了城管部门的人配合调查。”李月说,虽然他没有参加第二组的调查,但是在和调查组员的交流中还是了解到了调查的一些细节。

“孙中界事件”中的乘客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

的关键。21日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对陈雄杰的调查,调查组并非毫无准备地听其一面之词。”李月告诉快报记者,在整个调查开始之前,调查组除了查看孙中界被查处时的案卷外,还抽查了原南汇区行政执法大队今年以来的多份案卷,其中就发现陈雄杰多次以“乘客”身份作非法营运的笔录。

“在调查之前,可以说每一个调查组成员对本事件都没有个人的倾向,调查组成员、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院长薄海豹律师甚至对此事件了解甚少。”李月说,但是在通过案卷的抽查后,调查组成员心中有数了。

在对陈雄杰的调查中,薄海豹律师展示了他专业的问讯技巧及判断能力。薄海豹问:“你是否第一次配合执法?”陈答:“我是第一次。”薄再问:“假设是否有第二次?”陈答:“没有。”薄又问:“如果有,就证明你不是一般乘客,而是一个‘钩子’,可以这样认为吗?”他说:“可以。”薄最后问:“你是否能配合公安测流测试?”陈答:“可以。”“因为有了前期的准备,通过这一对话,调查组马上判断陈雄杰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有可能是‘职业钓钩’。”李月说,随着调查的深入,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还多次出现另一再一姓名的“乘客”,调查组随即就这一现象询问了配合调查的一名城管,但该城管未置可否,不过他却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即“有奖举报”的财务资料。

李月告诉快报记者,由于查处“黑车”行为为“有奖举报”,协助查获“黑车”的乘客可至行政执法大队领取“专项整治劳务费”,因此通过财务资料的查询也能找到相关“举报乘客”的线索。“就是这个财务资料让‘钓钩集团’彻底现身。”李月说,调查组在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陈雄杰的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另有其人,而且不同“举报乘客”的“劳务费”大多都在这名叫蒋国辉的人领取。蒋国辉每次都是多笔“劳务费”合并领取,数额相当惊人。

真相之后 征途仍漫漫

“虽然‘孙中界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但是‘钓鱼执法’所折射出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的漏洞还需要漫长的道路去修复和完善。”在采访最后,李月这样对快报记者说。

联想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过程,“孙中界事件”的真相其实不难查清,但为什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会在20日公布这样一个草率的调查结果?“这就是问题所在。”李月说,当时一方面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急于对此事作出回应,所以其调查肯定存在问题,而且明显是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有人说了谎。“最关键的错误是,20日的调查报告称‘取证手段并无不当’,这是说谎,‘倒钩执法’对他们来说是心知肚明的。”

另一方面,20日的调查报告过于强调对于孙中界行为的法律适用,凸显出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李月告诉快报记者,原南汇区交通警察执法大队负责人曾对他表示,定义“黑车”在“业内”只要满足四个条件即可:扬招、听乘客指令行驶、司机和乘客互不认识、提供有偿服务,除其中一事完全符合这四个要求。

“而事实上,对于黑车的界定现在法律法规上还很模糊,比如‘拼车’,算不算违法,没有人知道;打车时几个人合打是否合法,在法律上也是空白。”

李月说,要防止“孙中界事件”的再次发生,还有漫漫征途需要我们去走。

是否发现了其他‘钓头’?面对快报记者的疑问,李月表示,对于这一情况,第二小组并没有通报。不过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查处孙中界的行动中,不仅仅有交通执法大队队员,还有公安民警参与其中。“现在整治黑车行动中都会配备警力,主要是因为真正的黑车都是团伙化的。”李月告诉快报记者,以前就出现真正的黑车司机在被查前,一个电话就招来一大批人,将执法人员围困起来,有时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而据南都周刊记者调查,事实上,“钓钩集团”往往和黑车沆瀣一气。据一位前“钓头”罗雄透露,养黑车是钓头的另一项生财之道。如果养20辆黑车,一辆车每月交300元信息费,年收入就可达六七千元。抓车时,钓头会和时给黑车司机发来信息:“上班了”,意思就是不能做了;“好了”,“下班了”,就是可以开车接客了。

据南都周刊记者调查,在闵行北桥一带,黑车司机们买信息的花费,一手信息是每月500元,二手信息是300元,一手信息是100元。在张辉被钓的俞塘村,司机李师傅原来从不相信信息费,在几次被钓之后,终于醒悟过来。现在,他每天看约车信息,比看天气预报还积极。

“这也可以想见,为什么会出‘倒钩’执法,真正的黑车抓不到,被‘钓’的往往都不是黑车。”李月说。对此,上海市市政府决定成立整顿交通营运市场秩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专项工作组,坚决依法整治非法经营行为,维护交通营运市场的正常秩序;坚决禁止交通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的不正当调查取证行为。

真相之后 征途仍漫漫

“虽然‘孙中界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但是‘钓鱼执法’所折射出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的漏洞还需要漫长的道路去修复和完善。”在采访最后,李月这样对快报记者说。

联想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过程,“孙中界事件”的真相其实不难查清,但为什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会在20日公布这样一个草率的调查结果?“这就是问题所在。”李月说,当时一方面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急于对此事作出回应,所以其调查肯定存在问题,而且明显是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有人说了谎。“最关键的错误是,20日的调查报告称‘取证手段并无不当’,这是说谎,‘倒钩执法’对他们来说是心知肚明的。”

另一方面,20日的调查报告过于强调对于孙中界行为的法律适用,凸显出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李月告诉快报记者,原南汇区交通警察执法大队负责人曾对他表示,定义“黑车”在“业内”只要满足四个条件即可:扬招、听乘客指令行驶、司机和乘客互不认识、提供有偿服务,除其中一事完全符合这四个要求。

“而事实上,对于黑车的界定现在法律法规上还很模糊,比如‘拼车’,算不算违法,没有人知道;打车时几个人合打是否合法,在法律上也是空白。”

李月说,要防止“孙中界事件”的再次发生,还有漫漫征途需要我们去走。

孙中界 无法复原的“断指”



10月26日,孙中界(前右)得知处理结果后激动不已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我们兄弟俩以后……在上海可能混不下去了。”上海浦东微山路口,华灯初上,孙中记的眼神有些迷茫。这是2009年10月29日的傍晚,离孙中记的弟弟孙中界被“钓鱼”执法过去已整整半月。从被“钓鱼”,到断指,审查,调查组调查……从河南来到大上海不久的农家少年孙中界,猝不及防地卷入全国舆论漩涡的中心。半个月里,几番峰回路转,裹着绸带东奔西走的孙中界从愤怒、绝望,到喜极而泣,最终,却难以高兴起来。

□快报记者 常敬 | 上海报道

兄弟 憧憬中的上海未来

孙中界第四人,他是老小。孙中记和两位姐姐对这个小弟尤为照顾。“在家里,两位姐姐都很惯他。”孙中记觉得,弟弟性格的耿直和执拗,也许跟他从小就受全家的呵护有关。2006年,15岁的孙中界初中毕业后,没有再继续上学。因为年龄太小,家人没让他出来。在家闲了一年后,哥哥帮他他在无锡找了份工作。那时,孙中记已经在上海鹿源建筑工程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了两年,认识了不少朋友。俗话说,长兄如父。孙中界走出河南商丘农村老家后,就一直受到哥哥的照顾。孙中界在无锡干了近一年,哥哥又介绍他到上海外高桥食品保温箱厂上班。几个月后,孙中记征得公司领导同意后,让弟弟来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开混凝土搅拌车和铲车。“我在公司里管车子,弟弟开车也是我手把手教会的。”提起这个小他12岁的弟弟,孙中记的声音充满怜爱。“弟弟性格耿直,老实善良,没一点坏心眼。”

7月20日,已年满18岁的孙中界终于拿到了驾照。他先回家帮家里农忙,然后再来上海,正式开始自己的职业司机生涯。当时,家里刚刚建好房子,借了四五万元的外债。孙中界打算好好干,挣钱帮家里还债。当然,最好就像哥哥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争得立足之地。

“10月11日晚,弟弟上了火车,12日到上海,休息了一天。那天我在公司帮他办了手续,开始正式试用。”弟弟正式上班前,孙中记一再叮嘱他,“在上海找工作不容易,公司在上海好不好,千万不要听,看着躺在病床上咬着嘴唇默不作声的弟弟,孙中记拨通了上海媒体的电话。

媒体介入后,顿时掀起轩然大波。10月17日,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真相。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查获的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得知这一结果的孙中记兄弟俩,“弟弟整个人就像傻子一样,

住,说他非法营运,要罚款1万。被吓蒙的孙中界哀求道:“大爷们哪,你们一定要看清楚,我确实不是黑车。”晚上9点半,憋了一肚子尿的孙中界终于被迫在“一式三份的单子”上签了字。

回到出租屋的孙中界将事情来龙去脉跟哥哥讲了一遍,管车子的哥哥有点急了。“我第一反应是,我很相信我弟弟,但车子因为这个原因被扣了,我到公司说不清楚。”孙中记问弟弟:“谁要你拉人的?”弟弟委屈地说:“我做好事……”“你不知道现在做好事很难吗?现在社会上有多少陷阱你知道吗?”弟弟情绪非常激动,咚咚咚跑下了楼。接着哥哥就听到“哐”的一声响,他以为弟弟在楼下砸了电视机,赶紧跑下去,发现弟弟在床上躺着,地上好多东西。掀开被子,孙中记看到弟弟左手小指还只剩下一点皮肉相连。“我心疼死了,又说了他两句,他激动地拿刀往头上砍,被我们拉住。”从弟弟断指到最终真相大白,孙中记不敢再离开弟弟一步。“他真的很想生,我怕他出事。”

想轻生的不光是弟弟,孙中记脑子里也闪过轻生的念头。“这个事情不弄清着,我就不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弟弟都变成那样了,我做哥哥的心里什么滋味?”

事后冷静下来,孙中记理解了弟弟断指的行为。“他为什么会这么干?主要是心理因素。家里欠这么多账,父母年龄又大了。刚到上海找到工作,车就被‘钓’走了。他跟任何人讲不清楚,包括跟我也讲不清楚。这么大的压力下,他这么小,他能怎么样?”

曲折 等待清白的煎熬

弟弟断指后,哥哥两次拨打110报警,但警方处置冷漠。公司领导出面去要车,也空手而归。车子被扣,兄弟俩又交不起1万元罚款,看着躺在病床上咬着嘴唇默不作声的弟弟,孙中记拨通了上海媒体的电话。

媒体介入后,顿时掀起轩然大波。10月17日,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真相。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查获的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得知这一结果的孙中记兄弟俩,“弟弟整个人就像傻子一样,

不哭,不笑,也不说话,眼睛直直的。”孙中记心里窝着火。

第二次调查结束后,10月26日上午,联合调查组证实原南汇区行政执法大队采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向孙中界表示诚恳的歉意并表示将归还被扣车辆,同时承诺一切财产损失可以协商或提供国家赔偿。

孙中界哭了。当晚,他抱着枕头发了一夜呆。

迷茫 上海已成伤心地

真相大白于天下,但孙中界却未能及时拿回面包车。29日,兄弟俩和律师郝劲松在执法局门前等了一个多小时,但门都没进去。孙中记反复拨打执法局的电话,但一直是占线就是没人接。这一天,执法局门前聚集了上百人,他们都自称是“钓鱼执法”的受害者,要求讨个说法。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开始办理被“钓鱼执法”车主登记,让凡是被“倒钩”过的“车主”前往信访部门登记。到当天下午,登记人排号已达2000左右。

30日上午,孙中记和郝劲松坐在宾馆房间里,每隔几分钟就拨打一次执法局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孙中界没在房间里。“这两天他情绪又低落,什么人家都不想见,什么话都不想谈。”孙中记其实一直在保护弟弟,“他手伤了,才18岁。”孙中记最担心的是,弟弟出来“有危险”。面对媒体时,也多是孙中记应对。孙中界的手机被打爆了,暂时没换新手机,跟外界的联系一直是通过手机记。10月31日上午,孙中记兄弟终于取回了车子。“我们俩感谢全国的媒体。”孙中记一再向快报记者重复道,没有媒体的关注,他们俩现在还不知道会怎样。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除了弟弟的手,指向永远无法完全复原外,还将会有什么。

“这件事有好有坏,好的是,我们俩感情更深了。坏的是,以后我们可能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孙中记声音低沉。这些天,他一直请假。他们下一步就想就孙中界的医药费等进行索赔,关于将来,孙中记兄弟暂时没考虑过,也不知道怎么办。“总之,上海在我印象中心,没那么好了。以后在生活中,要处处小心。”

孙中界、张晖辩护律师郝劲松: 做人要站起来,别蹲下

郝劲松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2005年4月9日,郝劲松开通公益维权网站,将工作重点集中到公益诉讼上来。在此次上海“钓鱼事件”中,他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被“钓”者孙中界和张晖的辩护律师,以他特有的方式,为这些“受害者”讨回公道。

人要学会面向太阳

星期柒新闻周刊:在您的个人网站上,有一句座右铭:当你背向太阳的时候,你只会看到自己的阴影。这句话对于“钓鱼执法”之类的事件,有什么意义?

郝劲松:太阳有灼热的光芒,很多人看到它,会有一种畏惧和逃避,一般人会背向它。中国很多人就是这个状态,面对貌似强大的力量时,一般会选择屈服。在精神上,是跪着的,蹲着的。如果你背对太阳,就看不到光芒,希望,只看到自己的阴影。在类似于索要火车票、“钓鱼执法”等事件中,很多人认为,个人力量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团队,我们无力去改变,这是一种背向太阳的心理。在某些事物不可能时,试一试非常重要。不试,改变不了,试一下,可能有百分之之一的希望,努力一下,会有百分之五、再努力,百分之十、五十、八十,到一百,就会彻底改变。

郝劲松:这是追求的一个方向。很多人都想实现宪法赋予的那个世界,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权利无法兑现。为什么讨厌屈服?从历史看,中国人很多人是受压抑的,表面上站立,精神上屈服,很多人每天都在屈服。我们需要什么宪法条款不去只是纸面上的条文,无法真正变成现实。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总说要火车票不同,华南虎事件和“钓鱼执法”事件您都不是当事人,为什么会介入?

郝劲松:我虽然不是当事人,但我是公民,我对这个国家出现的所有事情都有监督权,换句话说,对所有的官员和政府机关,我享有监督权,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在华南虎事件中,我作为个人,也是受冤者,我有质疑真假。当我发现比较充足的证据时,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揭露它。

至于“钓鱼”,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不光是上海人。孙中界和张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缩影,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开车的公民都有可能遇到,这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媒体称您为刁民,还有刁士。您怎么看?

郝劲松:刁民这个词是贬义。现在是法制社会,我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不是刁民。刁士谈不上,我是法律战士,一个为法律冲锋陷阵的战士。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评论认为,孙中界断指事件和“开胸验肺”事件一样,具有标本意义。您对此怎么看?

郝劲松:标本之所以成为标本,是因为背后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大家都去关注它,它就会影响到很多人。我们国家在前进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标本性事件。通过舆论的放大,来促使有关部门改变错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结果可能是,类似的情况可能不会再发生。

星期柒新闻周刊:“钓鱼执法”事件已经真相大白,您会到此结束吗?

郝劲松:不会。这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孙中界和张晖被栽赃陷害仅仅揭露了冰山一角。我每天收到上海大量车主的来信和电话,反映自己已被钓鱼执法的情况。目前,我和助手正在做这方面的统计和调查工作。我已经在28日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出举报信,举报上海“钓鱼执法”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认为,凭您一人之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些?

郝劲松:我的力量非常有限,我只能改变局部。但我成功改变某些局部时,当通过舆论放大效应,让很多人看到经验和希望,他会模仿,更多人会站出来去改

10月26日,上海浦东通报“孙中界事件”调查处理情况并公开道歉。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